



李明高 编著

译读

齊魯書社



文心雕龙

李明高
编著

译读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心雕龙译读/李明高编著.—济南:齐鲁书社,2009.5

ISBN 978 - 7 - 5333 - 2201 - 4

I . 文... II . 李... III . ①文学理论—中国—南朝时代
②文心雕龙—注释③文心雕龙—译文 IV 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5979 号

文心雕龙译读

李明高 编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ls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16.25

插 页 2

字 数 390 千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33 - 2201 - 4

定 价 34.00 元

序

苏兆庆

一千五百年前刘勰创作的《文心雕龙》在中华大地问世，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大辩论，尔后，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亦逐渐进入高潮。莒县学者在刘勰与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讨论中，做了大量工作，新观点不断出现，尤其是在《文心雕龙》的版本、注释研究中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，李明高先生就是莒县研究者的优秀代表。李先生对于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有全面独到的见解，这些见解集中表现在这部《文心雕龙译读》中。此书是专门谈《文心雕龙》校勘、译注的，从中可以看出李先生对《文心雕龙》的识别、鉴赏和总体融会贯通的学养和功力。

《文心雕龙》用形象的语言说明复杂的问题，许多句法都是化用古籍，不深钻细研难探其奥义。刘勰生长在文风绮靡的南北朝宋、齐、梁时代，对当时的文学情况很不满意。他从儒家立场出发，认为：“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，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”然而当时文坛的情况却“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肇悦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”。刘勰写《文心雕龙》的动机，就是要扭转当时浮华的文风，使之归于平实。

《文心雕龙》全书共五十篇。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正纬》和《辨骚》五篇是总纲，阐述文学应该宣扬圣道、裨益风化的道理；

《明诗》至《书记》共二十篇，论述各种文体的源流和前人作品的优缺点；《神思》至《隐秀》十五篇是发挥作者对创作过程的见解和创作的要求，也包括一些关于文章作法的意见；《指瑕》至《程器》九篇，是着重论述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；最后是《序志》篇，是全书的总结自序。其理论观点首尾一贯，各篇之间又互相照应。如作者所言：“众理虽繁，而无倒置之乖，群言虽多，而无棼丝之乱。”其体大思精，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。

同时，在读《文心雕龙》时，还可以体会刘勰教我们如何学会写作、如何学会体会诗文的同时学会如何做人、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快。刘勰博大精深的文学内涵和深邃幽远的哲学思考，给后人以无限生机和智慧。

《文心雕龙》是我国古代的文论巨著，是文人必读之书，因而在历代阅读、抄录、注释流传的过程中，难免以讹传讹，误抄、误注、误译等问题不少，扭曲了刘勰的本意，误导了读者，增加了理解难度。

明高二十年前读高中时，就非常喜爱写作，读过《文心雕龙》全译本，他更渴望了解《文心雕龙》原文，而后尽力搜寻，二十年收藏可谓珍本甚丰。他在博览之时，发现在版本校勘、文字识读、征引条目、字义与校勘上，各家差异较大，有的甚至无章可循。他历经几个春秋，编撰《文心雕龙译读》。该书考证校、注、译中的诸多疑难问题：前贤悬而未决者百余条，前贤未发现者三十余处，字书解注值得商榷者二十余条。在考证这些问题时，明高治学严谨，广征博引，无证不信，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。他为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作了一件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，值得庆贺。

明高善于发现《文心雕龙》的疑难问题，看他的书，宛若聆听他数算家珍，娓娓悦耳。今大作书成，明高邀我作序。我们都是莒人，忝为同乡，且承蒙高谊，义不容辞，故不揣翦陋，姑散漫缀文如上，算是序。

戊子年立夏

前言：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

捧起一本以前并未读过的书，读者的第一念头就是想了解这本书有没有新内容，有多少新内容，而这也正是笔者首先要说明的。

第一，关于使用的版本。人们都知道，本之不确，末之谬远。做学问，尤其是译注方面，选择谁的作品、选择该作品的哪一个版本，至关重要，因为不同时期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会形成各自不同的面目。笔者所选择的《文心雕龙》的版本是明代王惟俭的《文心雕龙训故》本。选择该版本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：

一是该版本的收藏价值。王惟俭的《文心雕龙训故》年代较早，存世较少。比王惟俭稍晚的清初杰出文人、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禛尽力搜寻，历经二十年才访得，可见其得来不易。该版本，被许多“文心学”专家称为“《文心雕龙》版本中的珍品”。

二是该版本的研究价值。王惟俭在明代显赫的学人中，是数得着的领军人物。他的《文心雕龙训故》，是目前存世最早的《文心雕龙》注释本。于其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较古的《文心雕龙》传本的原貌及其在流传中形成的独特风格，而这些，在“完整”校勘后的版本中是看不到的。

三是该版本的普及价值。正因为该版本有其独特面貌，加之存世极少，一般读者难以见到原貌，所以更有必要循着王惟俭弘扬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这一文化瑰宝的足迹，再将其传播至广大民众。《文心雕龙训故》原本，笔者已经委托出版社影印；还需要出版一本关于《文心雕龙》的通俗读物，方能使其从专家、学者的殿堂引领至

“寻常百姓家”。

第二，关于校勘方面。《文心雕龙》已经出过不少的校勘专著，如王利器、杨明照、范文澜、刘永济、林其锬等先生，对推广、普及这一文化名著产生过和产生着巨大作用。纵观前贤的校勘巨著，大都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入手的，相比较而言，笔者采用的是文献学与文字学相结合的方法，有不少字的研究是从书法学方面着手的。由于研究的思路相对宽一些，研究也就有了不一样的结果。

一是在部分字的识读上。由于《文心雕龙》敦煌本系手抄本，需要对写卷进行文字识读，即使是刻本，仍然需要从汉字的变迁史上加以认证，不能简单地从现代白话文出发来加以判断。如《哀吊》篇“然腹突鬼门，怪而不辞”，笔者所见的目前发行的《文心雕龙》的出版物，包括字典、词典，征引时大多作“履突鬼门”，偶见作“復”字，皆非。该字在敦煌唐写本、宋本《御览》、明王世贞批本中均作“腹”字，因为在唐写本中系草书，校勘者多误识，《御览》引时实作“腹”字，校勘者又多误引作“履”字。如果对草书的书写规律有所把握，就能领悟到敦煌本实作“腹”字这一点。又如《正纬》篇：“今经正纬奇，倍撻千里，其伪一矣。”句中“倍撻”一词，众家各抒己见。不少学者认为，该处为“摘”字，“摘”通“适”，“适，悟也”，该义为抵触。“倍”通“背”字容易理解，“撻”(zhì)字，《汉语大字典》释之：“《说文·手部》：‘撻，投也。’段玉裁注：‘今字作掷。’”“撻”，《汉语大字典》标有三种读音：zhì、tì、zhāi，只有第三种读音才同“摘”。该义，《集韵·麦韵》云：“摘，取也。或从适。”也就是说，只有在第三种读音的情况下，“撻”才通“摘”，或从“适”，并非无论何种语境下“撻”都与“摘”通。如果换用今字而不采用古字的话，该处应为“掷”，而不为“摘”。写为“摘”字，盖形近而误。“倍撻”意即“背向投掷”。又如《奏启》篇“皂饰司直，肃清风禁。笔锐干将，墨含淳猷。”作“皂饰”还是“皂饬”，目前“文心学”界争议最大且尚无定论的莫过于此了。笔者认为，无论从传本上来看，还是从字源、字义上来看，都应为“皂饰”。从传本上来看，元至正本、明王惟俭训故

本皆作“皂饰”，然而，校勘者援引时却作“饬”，引用有误。从字源上来看，元至正本、明训故本作“餚”，《大广益会玉篇》有注，“餚”字为“饰”字的俗体字，《集韵》、《隶辨》有相同的见解。

二是在部分征引条目上。无论校或注，都需要征引资料来加以佐证。有的资料本身正确，但因为征引时粗疏或校对不精等方面的原因，致使征引条目与原资料不一致；有的是因为资料本身有误，因为征引者的认识局限，不能识别，照搬而误。笔者在译读期间，对觉察到的认为值得商榷的征引条目进行了简单列举，加以纠正。如《宗经》篇“义既挺乎性情，辞亦匠于文理，故能开学养正，昭明有融”之“挺”字，或校作“挺”，或校作“挺”，或谓“挺通挺”。《汉语大字典》释：“《集韵·仙韵》：‘挺，和也。’唐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一三：‘挺，揉也。’”实际上，中华书局影印本《宋刻集韵》、日本元文三年至延享三年狮谷白莲社刻本《一切经音义》（影印）原文均作“挺”，不作“挺”。鉴于此，应作“挺”，唐写本作“挺”，乃形近而误。又如《奏启》篇“必敛辙入规，促其音节，辨要轻清，文而不侈，亦启之大略也”，《汉语大词典》释“敛饬”时引：“《文心雕龙·奏启》：‘必敛饬入规。’”笔者个人认为该释例误。“辙”字，目前校勘者或校作“彻”字，或校作“饬”字，后者形成绝对主流。笔者认为该字不能这样理解。“辙”字，本义为“车迹”。“规”，本义为“车轮转一圈”。现代汉语认“彻”为“辙”的简化字，只有“通”一种含义，故不取。《字汇·彳部》释：“又辙迹……本作辙，伪作彻。”由此，无论从音、还是从义上来考察，“敛辙入规”之“辙”，在现代汉语中的对应字应为“辙”字。训故本不误，众家随黄注本改作“饬”字误，或取简化字作“彻”字亦误。

三是在部分字的讲求一律上。校勘者多讲求篇中、书中一律，有时误改了原本正确的字。如上面提到的《宗经》篇之“擿”字，篇中还有“伪既倍摘，则义异自明，经足训矣，纬何预焉”，句中“摘”字，有的把前面的校作“摘”字，有的既已校作“擿”字，把后面的“摘”字也要校作“擿”字，实乃刻舟求剑之法，极误。根本原因在

于，前者之“倍”，义即“两旁反出”，见高诱注《吕氏春秋·明理》：“在两旁反出为倍，在上反出为倚。”后者之“倍”，义即“其非一物”，见《释名·释衣服》：“佩，倍也。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，有珠玉、有容刀、有……之属也。”

四是在部分字的字义与校勘上。《文心雕龙》中有不少字难懂，这早已是共识，如何通过理解字的本义，甚至结合整句、全篇的思想来进行校勘，目前仍是一个需要不断突破的难题。如《诸子》篇“迄至魏晋，作者间出，谰言兼存，琐语必录，类聚而求，亦充箱照轸矣”，句中“充箱照轸”中“照轸”二字难解。《本义》引《范注》云：“疑当作被轸。释僧祐《出三藏记集·集杂录·序》曰：‘书序之几繁充车而被轸矣。’”《白话》云：“疑当作折，折照双声。”笔者个人认为，此处“照”应为本义，《汉语大字典》释：“照耀。《说文·火部》：‘照，明也。’”“轸”，《汉语大字典》释：“车。”“照轸”也即“照耀车舆”，此义是说魏晋间著作犹如照耀车辆的珍珠，或照耀车辆的珍珠的光辉，极言其多。《高僧传·释宝亮》：“珠生合浦，魏人取以照车；璧在邯郸，秦王请以华国。”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、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、《艺文类聚·宝玉部上》、《艺文类聚·职官部·表》均有“照车”连文的例子。由此来看，“充箱照轸”之“照”，不误。又如《夸饰》篇“故自天地以降，豫入声貌，文辞所被，夸饰恒存”，句中“豫入声貌”之“豫”，多校、注作“预先”之“预”，或云“干预”之“预”。笔者认为，此“豫”实乃“悦豫”之“豫”。《周易》云：“《象》曰：雷出地奋，豫。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”《周易正义》孔颖达疏：“谓之豫者，取逸豫之义，以和顺而动，动不违众，众皆悦豫，故谓之豫也。”“逸豫”、“悦豫”在《艺文类聚》中多有连文。《一切经音义·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》：“悦豫：豫，余据反。珠丛曰：心安和悦谓之豫也。”再如《熔裁》篇“谓繁与略，适分所好”之“适”，或校作“随”。笔者认为，原作“适”不误。元至正本、明王惟俭训故本、明王世贞批本均作“适”，另外《明诗》篇、《养气》篇均有“适分”连文，作“适”不误。《校证》云王惟俭本作“随”，乃误引。“分”，注者

或谓“性格”、或谓“稟赋”，恐不确。“分”，当为“情志”。《文选·曹植〈赠白马王彪〉》：“恩爱苟不亏，在远分日亲。”李善注：“分，犹志也。”

第三，关于注释方面。杨明照先生早就提出，《文心雕龙》有重注的必要。其后，不少学者也提出类似的主张。笔者考虑其中的意思有两重：表面来看，是说有些字的既有注解已经明显地暴露出问题；更深层次来看，是说《文心雕龙》的校勘有了新的明显的进步，有些字是新校出的，自然需要重注。依笔者个人看，无论是校勘还是注释，仍然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。笔者在读书中，有些不同于前贤的收获，现略举一二。如《辨骚》篇“固知《楚辞》者，体宪于三代，而风杂于战国，乃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博徒，而词赋之英杰也”，句中“博徒”之义令人费解。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云：“安陵富人有谓盎曰：‘吾闻剧孟博徒，将军何自通之？’盎曰：‘剧孟虽博徒，然母死，客送葬车千余乘，此亦有过人者。’”裴骃集解：“如淳曰：‘博荡之徒。或曰博戏之徒。’”由此，众家多释为“赌徒”、“低贱”、“低下”一类。《汉语大词典》释：“博徒：赌徒；指低下者。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：‘固知《楚辞》者……乃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博徒，而词赋之英杰也。’”此条，《汉语大词典》恐不确。笔者认为，裴骃集解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所列“如淳曰：‘博荡之徒。或曰博戏之徒’”，应当引人深思。结合本文字义来看，“博徒”之义，应为前者，即“博荡之徒”，解为“放荡之徒”。本篇“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博徒”，刘勰意指《楚辞》对于《雅》、《颂》这类言辞“雅正”的作品而言，属于言辞虚妄浮夸的一类作品。又如《知音》篇“夫古来知音，多贱同而思古。所谓‘日进前而不御，遥闻声而相思’也”，句中“御”字的译注，或由《广韵》“御，侍也”引申为“亲近”，或注为“任用”，恐皆非。笔者认为，御，《汉语大字典》释：“通‘迓’。迎接。《集韵》‘迓，《说文》相迎也。’”《楚辞·离骚》“飘风屯其相离兮，帅云霓来相御”，王逸注：“御，迎也。”关于读音，“亲近”之“御”读为“遇”，迎接之“御”读为“压”，读音明显不同。此处应为“迎接”之义。

第四,关于译文。由于校勘、注释工作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,所以,译文的规范也就面临着不少问题,因为译与校、注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。译文可能会因个人的习惯而各有差别,但不能违背本义。现仅举部分感觉明显差异的:如《明诗》篇“黄帝《云门》,理不空弦”之“理”,众家注、解皆为“从道理上说”之类,所以整个句子译出来就是“黄帝时的《云门舞》,从道理上说……”笔者认为,此“理不空弦”之“理”应为动词,“弹奏”之义。枚乘《七发》“景春佐酒,杜连理音”、班固《汉书·张禹传》“禹性习知音声,内奢淫,身居大第,后堂理丝竹管弦”之“理”字均为“弹奏”之义。该句可译为:“黄帝时的《云门舞》,不会只弹奏琴瑟,没有播诗。”又如《书记》篇“万古声荐,千里应拔”,《本义》云:“声荐、应拔二词颇异,句意未详。”至于有些勉强的译文,不必列出。笔者认为:声即心声;应,《正字通·心部》释:“魏晋诗文属和曰应。”应即诗文的属和,此言笔札之互相往来、应和;荐,《汉语大字典》释:“通播。”播义即振,振者,飞扬、显扬之义。全句可译为:“酬答的心声飞扬万古,属和的诗文远播千里。”以上所举几例,均为用字准确、无需校勘的原文。至于校字存在较大分歧的,笔者在读书中力求将校勘这一基本功做扎实,然后再译。如上面所提的《奏启》篇“敛辙入规”之意,本人所见著述恐未中的者,原因显然是校对这一基础工作没做好,其本义应为:“像将军行走过的辙痕收缩到车轮转一圈。”也就是说,车过所形成的辙痕归其根本就是车轮转一圈,其核心用意在于言作“启”要高度浓缩,即文中所述“促其音节,辨要轻清”。再如《谐讔》篇“谜也者,回互其辞,使昏迷也。或体目文字,或图象品物,纤巧以弄思,浅察以炫辞,义欲婉而正,辞欲隐而显”,句中“体目文字”与“图象品物”均难直译,《范注》读来意为拆字,注者多从《范注》,但并未接触到字面意思为何。目,《经籍纂诂》释:“目,默也。默而内识也。”也即“通过眼睛观察来辨识”之义。“体目文字”意即“根据书写的形体来辨识文字”。“图象品物”意即“凭借描绘的图形来揣测物品”。“体目文字”讲的是猜字谜,“图象品物”讲的是猜物

谜。

以上所举的，是笔者在译读《文心雕龙》期间校、注、译所遇到的部分疑难问题。与其说是笔者因对字句产生疑问，进而求其正解，不如说是笔者在“文心学”中提出了如上问题。至于是否正确，还有待于专家、学者的检验。

粗略估计，笔者个人在本书中明确作为论题提出来的大约有百余条；除去前贤已经提出但悬而未决，笔者个人论证并有所得之外，个人发前贤所未发的约在三十处之上；发现《汉语大字典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释例征引《文心雕龙》字、词值得商榷的释义约在二十条以上。其中原文部分，笔者通过校勘，发现与通俗本不同而前贤多未涉及，想提醒学人在引用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，主要有以下十处：“倍擅千里”、“敛辙入规”、“腹突鬼门”、“老庄告退”、“哀者俵也”、“悲实俵心”、“姮娥奔月”、“乃相如接之”、“《丧服》举轻以包重”、“魏人因俳说以著笑书”。

第五，关于校勘使用的版本资料。笔者所使用的版本资料，比起王利器、杨明照诸大家来，实在是羞愧得很，因为与他们相比，笔者的资料较少。但是，笔者所使用的版本资料的首要一条：就是必须是可靠的。在有限的版本资料中，影印的有：敦煌唐写本、元至正本、明王惟俭训故本、明梅庆生音注本、明王世贞批点本；原本有：清黄叔琳辑注本、范文澜注本。关于经典的资料，大多是中华书局出版的，如《景刊唐开成石经》、《汉魏古注十三经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二十四史。作译读，首先要核对原文，选取一个版本，再利用其他版本来校，选取较早版本、合于语境的字。注、译过程中，遇到疑难字，则多方查找资料，寻其正解。如《诔碑》篇“影而效者，弥取于功矣”，句中“功”字，《校注拾遗》云“唐写本作‘切’”，误。唐写本左旁作“工”，并非“切”字的左边，右旁“刀”或“力”不甚清晰，但经放大观察，应为“力”，整字作“功”字。再如《事类》篇“夫经典沈深，载籍浩瀚，实群言之奥区，而才思之神皋也”，句中“才思”之“思”，或谓“思维”，或谓“思致”，《汉语大词典》释“才思”为“才气和思

致”。笔者认为，“才思”之“思”乃“智”、“睿智”之义，因为“才智”就是我们经常运用的词。再查工具书，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思，睿也。”再查经典，《尚书·洪范》云：“五事：一曰貌，二曰言，三曰视，四曰听，五曰思。貌曰恭，言曰从，视曰明，听曰聪，思曰睿。”至此，“才思”即“才智”之义也就算查到了。

第六，关于文字方面的工具书。译读《文心雕龙》期间，笔者对文字是非常敏感的，因为已经读了十几年，内容相当熟了，只要是感觉理解起来有疑难的，往往是因为前贤所著要么在校勘上有问题，要么在注释上有问题，让人产生疑问，读不下去。如何来澄清这些疑问？因为所处的环境既不是大学，也不是研究机构，所以最好的老师莫过于工具书了。笔者对文字工具书有一些苛求：如果有影印本，即使手头上有现代通行字体的版本，仍然也要想方设法找到影印本，因为只有影印本才可能保存着文字的原始面貌，更清楚地看到文字的演变与发展。笔者所使用的，有《说文解字》系列、《原本玉篇残卷》、《大广益会玉篇》、《篆隶万象名义》、《龙龛手镜》、《正字通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、《康熙字典》以及宋本《尔雅》、《集韵》等早期字书的影印本。现代编辑出版的，有《汉语大字典》缩印本（八卷本）及《汉语大词典》普及本（三卷本）。使用这些字书的目的，在于从字的渊源流变入手，历史地考察字的演变，科学地把握俗体与正体之间的关系，为校、注工作寻找依据。如《乐府》篇“志不出于滔荡，辞不离于哀思”，句中“滔”字，多有依唐写本校作“慆”字者。笔者认为，应为“滔”字。“滔”字为许多专家所不取，恐在于认为其表面意思不合语境。经查《汉语大字典》释文“傲慢，放任”，笔者对此字的来源有了新的认识；再查《文选·曹植〈赠丁翼诗〉》，有“滔荡固大节，世俗多所拘”，正为“滔荡”连文。再如《夸饰》篇“娈彼洛神，既非魑魅，惟此水师，亦非魍魎；而虚用滥形，不其疏乎”，句中“虚用滥形”之“滥”，注者、译者多解作“无根据”、“不切实际”、“乱”之类，这些解注让人感觉像是隔了一层窗户纸。待查《汉语大字典》才找到合适答案：“《资治通鉴·唐则天后圣历年》：‘金银器皆

行滥，非真物。”胡三省注：“滥，恶也。开元八年，颁租庸调法于天下，好不过精，恶不过滥。滥者，恶之极也。”胡三省之注，可谓是《夸饰》篇“虚用滥形”句的最好注脚。

有的字，因为用典的原因，如果查不到出处，就难以理解字面意思。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在阅读量不算太大的情况下，迅速、有效地找到该字的出处，有些用典也在其中。如《论说》篇“虽复陆贾籍甚，张释傅会，杜钦文辨，楼护唇舌，颉颃万乘之阶，抵戏公卿之席，并顺风以托势，莫能逆波而溯洄矣”，句中“抵戏”，大多从《鬼谷子·抵戏》作解：“戏者，罅也。罅者，涧也。涧者，成大隙也。戏始有朕，可抵而塞，可抵而却，可抵而息，可抵而匿，可抵而得，此谓抵戏之理也。”有注：“抵：抵塞。戏：隙。抵戏：意为堵塞有缺漏的地方。”笔者认为，此处依《鬼谷子》解恐非，校、注作“诋戏”、“抵噓”、“嘲戏取悦”一类，亦恐非，原文作“抵戏”不误。《汉语大词典》释：抵戏，即抵角戏、角抵戏，又简称“抵戏”。《洛阳伽蓝记·禅虚寺》：“有羽林马僧相善抵角戏。”“抵”，有“碰触”之义。《后汉书·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》：“目极角抵之观，耳穷郑韂之声。”注：“武帝元封三年，作角抵戏。音义云：‘两两相当角力，角伎艺射御，故名角抵……’”刘勰此处有两角相当而互相抵触之义，以此来类比辩士的唇枪舌战。

第七，关于综合运用。《文心雕龙》有许多地方，不是单凭某本工具书、某本经典即可查到正解，而是需要下工夫，运用已有的综合知识来加以分析判断。有时需要对原文反复琢磨，吃透原文篇中思想，将原文视作一个整体，然后，再将要校、注的字作为整体中的一个局部，使个体符合整体，这样，才会使全篇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，局部也不会与整体发生冲突。如《比兴》篇“毛公述《传》，独标‘兴体’，岂不以‘风’通而‘赋’同，‘比’显而‘兴’隐哉”，关于“风通而赋同”之“通”字，多有校作“异”字者，其原因，恐在于“比显而兴隐”中“显”与“隐”相对，所以求“异”与“同”对，极误。假设为“异”字，那么就失去了“独标兴体”的理由。只有“风通而赋同”，即

“风”与“赋”两者都很容易知晓，加之“比显”的情况下，才可能“独标兴体”。通，《汉语大字典》释：“通晓。《释名·释言语》：‘通，洞也，无所不洞贯也。’”另外，从版本上考察，元至正本、明王惟俭训故本、明王世贞批本均作“通”，黄注本改作“异”，后多有从者，恐非。再如《辨骚》篇“不有屈平，岂见离骚。惊才风逸，壮采烟高。”壮采，《汉语大词典》释：“壮美的文采。”“采”字，《本义》、《新译》、《今译》、《译注》等众书认为当作“志”字，然敦煌唐写本作“采”字，《范注》、《校释》、《校注拾遗》、《读本》等书认作“采”字。前贤已经指出《铨赋》篇、《隐秀》篇有“时逢壮采”、“而俱适乎壮采”的用法，笔者认为，更重要的在于，刘勰在该篇中并没有称赞屈原“壮志”的意思，相反，认为屈原“依彭咸之遗则，从子胥以自适”，是“狷狭之志”。鉴于此，与“壮”相连的该字必不为“志”字，应从唐写本作“采”为是。再如《诏策》篇“皇帝御宇，其言也神。渊嘿黼宸，而响盈四表，其唯诏策乎”，句中“渊嘿”连文何义？注者或作“沉默寡言”，或作“静默”，令人费解。笔者认为，既然是帝王，那么坐在朝堂上沉默不言，怎么能临朝执政？此解恐非。反复思索，结合查阅字书方知，“渊嘿”犹言“静渊”，义即“深沉稳重”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“静渊以有谋，疏通而得知。”悟此，可避“沉默寡言”之误。

《文心雕龙》中有的字，需要查阅南北朝时期或者更早的文献资料来加以确认。因为刘勰撰写《文心雕龙》，吸取了前贤的智慧，今天阅读，感觉有些地方难懂，也只有尽可能地将其放到那个时代才可能找到这个字的生存空间，也只有在那个时空里才可能看得到它的真面貌。如关于上文已经讨论过的“皂饰”还是“皂饬”的问题。“皂饰”多解作“黑色衣服”，恐不确。《出三藏记集·杂录·序》云：“由汉届梁，世历明哲。虽复缁服素饰并异迹同归。”生活在刘勰那个年代的释僧祐既然在文中作“缁服素饰”，可见文中并不能作“黑色衣服”来解。又如将“博徒”一词释之为“博荡之徒”，或许有些读者感到难以理解。但如果将“博荡”、“放荡”一类的词放在南北朝时期来考察，那么，疑问会立即烟消云散。南朝梁简文帝萧

纲在《戒当阳公大心书》中云：“立身之道与文章异；立身先须谨重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”皇帝拿“放荡”一词来训导皇子，难道会是今天事关生活的“淫荡”的代名词吗？它的本义在于作文要不拘泥于既有的程式化的框子。于此，我们可以窥见刘勰对《楚辞》的真正态度。读此一词，可谓事关批评史的大事，或许它将改变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关于刘勰对《楚辞》与《诗经》态度的评估。

第八，关于异文。对某个版本的校勘，如何既使它通俗能懂，又保留一点原来的面貌？笔者认为，此版本与彼版本之间的不同的文字，是研究版本流传的重要依据之一。试想，如果都是一字不差的“大一统”，读者怎么能窥知它在何朝何代的面貌？“异文”的存在，为我们察知《文心雕龙》在那个朝代的传播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，这也正是区别不同版本之间有没有“血缘关系”的重要依据。当然，由于汉字自身演变的内在原因，当前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读本恢复到令人难以识别的诸如“金文”、“篆文”等书体上，但是，我们对待“异文”的态度决不能一棍子打死。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，文字的使用相当混乱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通过《原本玉篇残卷》、敦煌遗书等原件看到这一点，即使是在大兴科举、文字日趋规范的唐代，尚需要刻《十三经》来规范读本，更何况俗体字特别多的南北朝。鉴于此，笔者在以王惟俭训故本为底本进行译读《文心雕龙》时，对异文格外留意，一遇到异文就查阅工具书，看看是否和通行本的字有相通之处，有时仅仅为了查一个字就要花整个晚上的功夫，时间最长的花了整整一个周末——两天时间。尽管这种方法在许多人看起来是很笨的，但最原始的方法往往最有效。如《总术》篇“是以执术驭篇，似善奕之穷数”之“奕”字，在训故本中出现多次，通行本改作“弈”字，清邵瑛《说文群经正字》认为“奕”通“弈”，经典文本中“统作奕”，并举《论语》“不好博奕者乎”为例。为方便阅读，部分异文只标注在注释或按语中，正文为校勘后的原文，使用通用的简体字，一般不出校记。博采前贤既有成果，有所取舍。

就像做事情要有缘由一样,或许有读者会问:笔者处在一个不关学术的岗位,为什么却研究起《文心雕龙》来?这也正是笔者想给予解答的。

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是莒县人。首先是《文献雕龙》的内容吸引了笔者,其次是笔者对《文心雕龙》的内容很感兴趣。

《文心雕龙》是一部指导如何写作的书,或曰是一部“文章学”的著作,这已经被许多专家所接受,但说其是一部“批评学”的专著,笔者个人不主张这样看,依笔者个人观点,《文心雕龙》是一部写作大观。二十年前读高中时,笔者非常喜欢写作,时常读《中国文学史》,这算是对《文心雕龙》所具有的第一印象。因为写作上的原因,又渴望了解《文心雕龙》原文,但没有现成的书籍。十八年前,笔者就读于济宁警校时,偶得《文心雕龙译注》上下册,当时并不怎么想通读全文,只是对“创作论”部分感兴趣,就反复读,用铅笔做了许多标记。随后,时常读,但还仅限于“创作论”那几篇。

几年前,莒县县委、县政府领导班子着眼于莒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,明确提出了“文化树县”战略。作为对“莒文化”研究特别关注的一名莒县人,为此做点什么,是笔者所思考的课题。笔者为一千五百多年前家乡就出了刘勰这样一位写出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巨典的才人感到骄傲,由是,笔者首先选择了《文心雕龙》。

笔者很清楚,“文心学”已经成为一门国际“显学”,研究、关注的学人不在少数,而在《文心雕龙》校、注、译方面,目前已经有不少的专著,但是,面对众多令人感到高山仰止的作品,笔者真的也想做点什么,因为就像许多专家所说的那样,莒县人研究刘勰,莒县人研究《文心雕龙》,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意味。由是,尽管笔者真的为自己微不足道的心得感到汗颜,但当此书初稿写成,自己也感到了一丝欣慰:毕竟为家乡的文化传播付出了劳动,为刘勰的思想传播做出了努力。至于说其分量,还有待专家、读者从这部书的本身去品评。

另外,我很想说的一点是,本书指出注本、译本甚至是字书中